

张炜：每次写作都要寻找新的语调

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李娇娇

年度长篇小说

张炜《去老万玉家》

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3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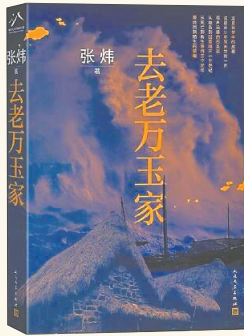
致敬辞

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张炜始终不渝深耕文学沃土，以沉雄笔力构建精神原乡，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常青树。他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《去老万玉家》，以个体成长映照时代变局，叩问乱世中人性的抉择与坚守，于乡土叙事中打捞时代印记。他的创作始终扎根大地、贴近人心，在一日千里的城市化进程中，是一缕照亮乡土、守护心灵的文学之光。



张炜

1956年11月出生，山东栖霞人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2019年出版《张炜文集》50卷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你在高原》等23部。



感言

今天是最需要文学的时代

这次来到广州，我的行走路线就像是《去老万玉家》主人公舒菀屏的行走路线。《去老万玉家》一书，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我最好的作品。它写的是美少年舒菀屏在广州和烟台之间发生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在我心里装了几十年，是埋在我心里最久的文学种子。

我一直想象这座温暖的城市长什么样子。后来我终于有机会来到广州，每次我都感到生机勃勃。所以有那么多人南下寻找绿色，寻找温暖，寻找生长，寻找生机。

书中大量篇幅写到了寒冷的“不可抵御”。这让我想到了最近不能回避的话题——文学的边缘化、文学的困境。

我固执地认为，今天是最需要文学的时代，也是最需要语言艺术的时代。一个族群未来的创造力，取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、语言水准与语言品质。这是我们对于一个时代的回应，也源于我们的文学信心。

访谈



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彦(左)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、社长任天阳(右)共同为张炜(中)颁发奖杯、证书

酝酿数十年才写《去老万玉家》

羊城晚报：您为何将《去老万玉家》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8世纪末胶东半岛？创作这部小说酝酿了多久？

张炜：酝酿了几十年。《去老万玉家》很难写，越大虚构，付出的时间和劳动就越多，否则你的想象就不能飞扬，笔就不能放肆。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、大的历史关节，都经过了反复考证，比如当年的那片海岸、气象、战事及故事现场，都需要一遍遍核实和体验。

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是中国与西方、与整个世界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节点。在这个节点上，胶东半岛和南方沿海比如广州，是最重要的两个地区。它们构成的南北呼应，是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及文化革命性转折的前奏和巨大推力。

《去老万玉家》的主人公舒菀屏，在广州同文馆接受了几年教育，在面临考试阶段，被英雄人物所感召，经历了一场拼命的逃亡。这个故事蛮惊险的。

羊城晚报：您小说创作据说迄今为止已达2300多万字，《去老万玉家》是否可以视为您又一部超越之作？

张炜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，《去老万玉家》可能是我个人最好的一部作品。衡量作品的好坏不需要其他人去讲，书写者自己完全知道。你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劳动，特别是在整个写作过程当中，这部作品多么强大地慰劳了你，犒赏了你。

写作最大的享受在于过程，不停地抵达，不停地给自己惊喜，给你动力再走一程。这一程一程，主人公就从广州到沙堡岛，再回到了广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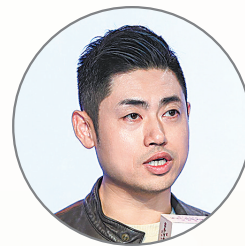
年度短篇小说

葛亮《风球》

花城出版社2024年5月

致敬辞

葛亮是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。他的小说创作既古典又现代，兼具洞察与情怀，在人情世故里透露小人物悲欢，于日常褶皱中捕捉人性微光，细微的描摹寄寓着大时代的隐约气息。其短篇小说集《风球》以沉静笔触剖解时代肌理，让日常叙事承载时代重量，不动声色地刻画出他所理解的“既恍惚闪烁，又风情万种”的香港，其中蕴含的历史情怀独树一帜。



葛亮

1978年3月出生，原籍江苏南京。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，著有小说《燕食记》《北鸢》《朱雀》《灵隐》《飞发》。



感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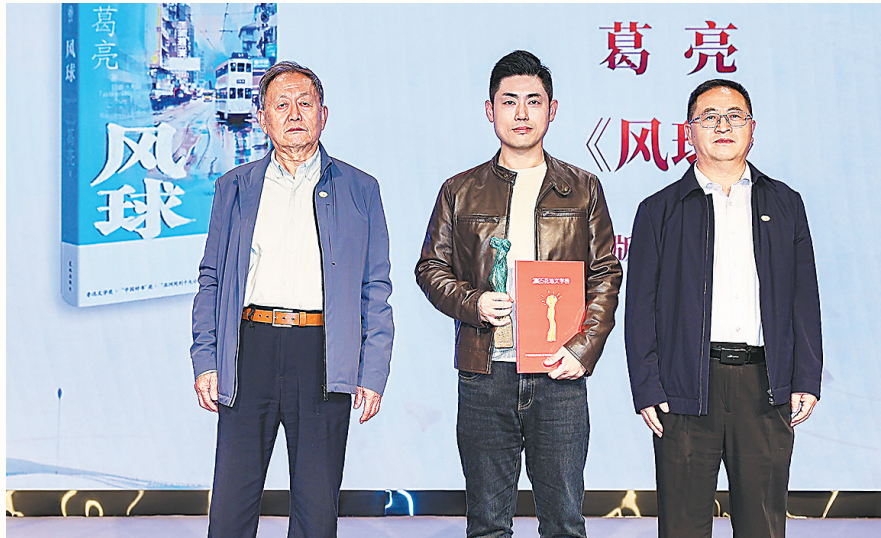
以南方为起点

我的文学创作以南方为起点。大约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《江南儿女生颜色》，从吴承恩、沈复，一直谈到旅港的叶灵凤。南京地处长江之南，却是有“北相”的城市。来过南京的朋友都可以感觉得到，这城市有很扎实的一面，或者可以理解为一种南北相融的包容感。

我在岭南生活的时间也很长，有二十多年，几乎和在故乡一样长。刚来的时候，并未有强烈的陌生感。这地区同样有包容的气性，这是海洋性文化天然的气质，代表了流转和汇聚。经世致用，这是岭南文化的基点，也是民间文化的“活气”。它的语言体系也是一样，保留了中古唐音，基底久远。所以它必然是动态的文化类型，一方面向外流转，一方面自身变动不居。在晚近的长篇小说里，我将这种流转的过程实体化了。

“南方”不仅是基于地理学的界定，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文化视野。

访谈



著名作家、天津市作协名誉主席蒋子龙(左)与广州市荔湾区区委副书记、区长李锋(右)共同为葛亮(中)颁发奖杯、证书

岭南是烟火气与古雅风的结合

羊城晚报：小说集以“香港”为背景展开九个故事，为什么以“风球”命名？

葛亮：这本小说集的其中一篇叫《浣熊》，“浣熊”来源于2008年登陆香港的一场台风的名字。后来小说集出版时，名字就改成“风球”。“风球”带来的不光是一种“席卷”，在“风眼”中还会造成许多可能性。

这本小说集的创作是围绕香港的不同维度、不同人群展开的，主题其实是这些人相遇的过程。香港可以说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文化实验场，这种层次的丰富性和文化互相牵扯的意味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就像书名“风球”一样，会产生不同的融流，呈现出一种异质层次的丰富性。

羊城晚报：这本书里的故事并不全是反映当下。您在序中也提到，写的是“残留”，是“怅然”，还带有些“黯淡”，

出于何种考虑？

葛亮：其实这种意味，在大多数城市都市化进程中都会存在。香港其实是有历史、有文化传统的城市，早在20世纪50年代，就曾出现过“乡土文学”的浪潮。这个部分恰是我想在这本小说集中表达的，所以小说中才会出现杀鱼、龙舟等像魅影一样存在的古老仪式和活动。

羊城晚报：因此《风球》中，您用到不少香港地道的粤语词汇，甚至还作出了一些注释。

葛亮：广府粤语很有特点，既有所谓九声六调，变化非常丰富，同时又下沉于民间，有活色生香、世俗的部分。它是烟火气与古雅风相结合的，语系结构非常有趣。这是我想传达的、关于岭南很好的部分，也是我想跟更多读者去分享的部分。

写作要“现场烹饪”，离开书桌就不想文学

羊城晚报：您现在还会用笔“爬格子”写作吗？每天大概写多少字？

张炜：我还是用笔写作，但我写得不多，一年用来写作的时间很少。我最激烈的写作也不会超过三个月，写长篇才会连续写三个月。但是我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多，顶多每天写三个小时，超过三个小时脑子就钝了。

羊城晚报：不写作时，您会将写作思路放在心里吗？

张炜：离开了书桌就不想文学，因为一想就会压迫潜意识。不要老去想它，心里边就会变得开阔，就不容易钻进死胡同里。真正意义上的

创作要依赖瞬间的爆发力。如果你反复想好了再回来写，等于内心里做好了“预制件”，在书桌上拼接起来还是“预制菜”。

写作要“现场烹饪”，越是即兴的创作越鲜活、新奇感越强，越能体现你此刻的激动、爆发，这时写出来的文字才是感人的。这个过程就是所说的“颠颠力”，“颠”和“颠”是古人形容鸟上下飞的两股劲。写作者既要顽强地保留不可重复性、不可兼容性，又要用公共约定去表达，要不停地抵抗着往前走，这就是文学创作的过程。

文学是生命现象，与职业无关

羊城晚报：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，您认为文学“边缘化”了吗？对您的写作有没有什么影响？

张炜：我从事文学写作50余年了，就自己的经历和所见而言，“文学”的产出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大，受众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。它不仅没有边缘化，而且已经泛化、潮流化、日常化。

文学既是生命现象，是心灵产物，但又具有极高的难度。也就是说，人人都有文学创作和享受的需求、能力，但其中最杰出的部分总是少之又少。它们需要时间的检验和筛选。正因为现在各种方式的文学呈现太多，阅读方式也太多，比如说仅仅是文学的纸质出版物，已经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千万倍。

正因为今天文学的“流径”太大，所以具体到某一部作品，对其注意力和集中阅读量一定会被分散掉，这是必然的。所以，这种现象不仅不能视为“文学的边缘化”，而且恰好相反，是数字信息时代文学的“普及化”和“巨量化”。在这个时代从事文学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需要更多恪守力、定力、顽强和高难度。

羊城晚报：近年来，以东莞为代表的“素人写作”蓬勃兴起，外卖员、清洁

工、摆摊小贩等普通从业者用文字记录生活，成为“新大众文艺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您如何看待“素人写作”和“新大众文艺”？

张炜：人人都有文学表达的诉求，这是生命现象，与职业无关。文学创作自古以来就是业余的，这才是正常的。专业写作是商品化的产物，基本上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发生的事情。文学写作的业余性质，在杰出的作家那里一直是深刻持守的，是他们植于心底的一个工作原则。

我要说明的是，时间就是大众，时间就是人民。越是高雅，越是大众。不能接受时间检验的作品，就不是大众的、人民的。

羊城晚报：在您看来，应如何为大众写作？

张炜：为大众写作，要极力地将个人不可取代的部分与公共规则相兼容，想办法将其放到世俗中，这是一个作家存在的路径。

反过来，如果作家用晦涩的语言传递自身的生命内核，所谓的“不可取代”最后会走向崩溃。尽管他对于雅文学、纯文学的提升和淬炼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，但是没有未来，因为从根本上脱离了世俗生活和大众。

文学创作令我的学术研究更有温度

羊城晚报：您的很多创作都与南京、香港这两座城市息息相关，从“江南人”到“岭南人”，您觉得自己的创作风格是否有变化？

葛亮：我觉得自己在写作中一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，那就是对历史的关注。编辑曾说我年轻时的创作有一种少年的“毛茸茸的质感”，或许对我而言是阶段性地实现了那个时间节点对于历史的关注。而我这本小说集则是写出了现在的我对香港的一些体验，是这个时期我想做的一件事。

羊城晚报：文学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您为什么选择了写小说来表达自己？

葛亮：在写作题材上，我也是在跟着兴趣走。写小说只是我文学表达方式的一部分。我觉得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这两个过程是互相加持的。因为我本身在从事文学研究，且希望我的研究更有温度，这才开始了文学创作。

羊城晚报：您如何看待长篇或短

篇小说的创作？

葛亮：我很喜欢写作这件事，比如我的长篇写作时间都比较长，五年到七年左右。长时期从事某件事情，如果不感兴趣，可能会让人觉得难以以为继，只有喜欢，才可以长期地投入。而这个过程，我自己是享受的，并不会感觉艰苦。

短篇小说经常被视为生活的横截面。对我而言，长篇小说更像是表达历史观的一种载体。而历史与当下也是相互观照的。比如我近年在作一些有关非遗的研究，于是便有了《燕食记》。接下来或许还会有更多这方面的呈现。

羊城晚报：您现在在香港浸会大学教授，会教自己的学生写小说吗？

葛亮：在我教的课程中，有一门课就是创意写作，但我从来不会教学生应该怎样写出好的作品。我上课基本上就只是讲经典。我只告诉学生们文本发展可以有怎样的可能性，然后让他们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东西。

谦恭自守是祖辈教给我最有意义的东西

羊城晚报：您的许多作品为什么会特别提到张爱玲？

葛亮：在研究工作中，我发现南下作家谱系从清末王韬之后，有其完整性的意义。他们在各自命运的特殊节点来到香港，丰富了香港文化的版图，香港也给他们提供了写作资料与相对安定的写作环境，可以说是彼此成就。

张爱玲在《传奇》中表达出了自己对香港的感知，同时奠定了她的创作风格。而我也正是想说出自己对香港的体验。我是到香港后才开始写作的，不过那时我多数笔墨都在写南京。这并不是说我当时没有融入香港的环境，而是觉得香港与我的原乡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感，我才想要去写南京。

近年来，随着我在香港生活时间越久，对岭南的印象越深刻，我也更愿意去书写岭南，比如之前创作的《燕食记》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这也是一种“相遇”。

羊城晚报：《北鸢》当年带来的关

注，也包括您身后的家族，家庭传统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？

葛亮：《北鸢》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，也是我想回馈家族的一次创作。与其说家族带给我一种优良传统，不如说他们提供给我一种为人的尺度。

比如我的祖父（葛康俞）也是大学教授、学者，他身上那种谦恭自守的品格，对我是影响巨大的。我觉得，谦恭自守就是祖辈教给我的最有意义的东西。

羊城晚报：现在人人都可以用AI进行创作，有人认为它只是一种复制粘贴，也有人认为它能打开创作者的思路，您怎么看？

葛亮：AI的出现一定有其意义，我对此抱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与尊重的态度，我相信所有的出现都有意义。而且不同的写作者会有不同创作方式，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选择。至于我，目前还是会遵从传统的创作方式。